

进城农民工就业路径与方向

——基于一种社会网络理论分析

宁慧,李桂平

(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摘要] 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大规模的农民工向城市流动寻找就业机会,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农民工社会网络的范围,由强关系、初级关系、同质性为特点的封闭的乡土社会网络,向以弱关系、次级关系、异质性为特点的城市社会关系网络转化,从不同的异质群体互动交往获取不同的信息与资源。

[关键词] 农民工;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差序格局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229(2009)04-0015-03

一、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理论简介

1.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分析用于描述和测量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通过些关系流动和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东西,如信息、资源等。社会网络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从20世纪50年代起社会学开始大规模地使用网络分析的理论框架,引入了“嵌入性”的概念。格兰诺维特认为,信任来源于社会网络,而人们的经济行为同时也是嵌入于社会网络的信任结构之中。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强关系和弱关系概念,他认为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纽带联系。在社会网络分析中,根据下列四个测量指标来分析和解释行动者的社会行为:

(1)网络规模 它是指构成一个个社会网成员的数目,它测量的是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数量,这就意味着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

(2)网络密度 密度是指网络中一旦行动,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实际数量。

(3)网络强度 根据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关系强度的概念,他从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互惠交换四个维度来衡量关系强弱,如果互动频率高、情感投入高、亲密程度、互惠交换度高,则称为强关系,反之为弱关系(边燕杰弱关系),关系越强,越可能共享和交换资源、关系越弱,自我在工具性行动中越可能获取好的社会资本。

(4)趋同性与异质性 趋同性是指特定行动者与网络成员在各个社会特征之间的相似性,行动者常常有更多的机会或更倾向于年龄、教育程度、职业等

背景相近或相似的人交往,倾向于群内交往;异质性则是指具有不同特征的成员在社会网络中的交往,异质性指数越高,标志着一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本越丰富。

2. 社会资本理论

最早倡导社会资本的概念的两位学者是布迪厄与科尔曼。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因为在一个以熟识为基础的、带有一定制度性的持久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可以得到某些存在的或潜在的资源。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则是个体或组织为实现一定目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那部分社会资源^{[1](170-172)}。

而林南更进一步地将社会网与社会资本结合起来,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及社会网络中所包含的诸种资源,更明确地使社会网分析与社会资本理论融为一体的定义。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弱关系的对象处于比行动者更高的地位,他所拥有的弱关系将比强关系给他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由于弱关系连结着不同阶层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所以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通过弱关系纽带来完成。

托马斯·福特·布朗用系统主义的观点把社会资本按照不同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以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亲缘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等等构成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以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组织惯例、习俗、规则等形式存在;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社会资本在其中运作的网络和组织是如何嵌入到更大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宏观社会的环境中去的。

二、农民工社会网络的特点:封闭的、强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网络

由于中国社会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也比较注重人情、关系,而农民工进城就业,特别是第一次,大部分是借助乡土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网络,具有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农民工对进城就业,对城市的一切感到陌生,特别是在城乡的二元结构的影响下,城乡之间形成无形的边界阻隔,依赖和信任他们乡土网络中的群体,这样不仅能在生活上给予帮助,而且能在精神上、心理上给予安慰,避免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价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研究发现,农民工进城就业过程中,虽然社会网络对他们获得城市中的工作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他们主要依靠强关系来寻找工作,以信任为基础,通过亲缘、地缘关系社会网络纽带,都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提供就业信息,而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形成一种封闭的社会网络,造成农民工进城就业封闭的网络社会网络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1. 自我认同——社会网络的封闭

初进城市的农民工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乡土社会网络在互动过程中,人们在地位、态度、信仰等方面相似,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由于长期局限于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往往形成自我封闭的亚文化群体,与城市交流文化处于隔离状态,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不能在城市中找到定信与归属感,因此,“边缘人”也会在自己的内心多次出现,造成社会网络的内倾性。由于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认为农民工素质低、不讲文明卫生,破坏社会秩序,这种社会标签反过来更进一步加深农民工内心的自我认同。因此,在求职过程中,不能借助外力,只是网络寻求以血缘、亲缘、地缘的初级群体。

2. 社会排斥——社会网络断裂

孙立平在《断裂》中,把城乡二元结构看作是社会断裂的一种形式,二元结构造成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由行政主导的,还是由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以户籍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事实上也把城乡两部分群体进行了分层,农民工群体被划分为弱势群体^{[2](67-73)}。同时,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发展,农民赶不上时代的步伐被抛在后面,城乡居民差距拉大,阻碍了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城市的边缘群体,城市居民强化了对他们的排斥,把他们排斥于城市网络圈子之外,造成城乡网络圈的断裂。

三、社会网络的扩展:农民工就业网从封闭走向开放

社会关系正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

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其关系脉络如同蜘蛛网一般逐渐向外扩张与延伸,并因而逐渐呈现不同程度的开放性,人们寻找关系的路径顺序是家庭亲戚、朋友和熟人,这一顺序就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扩展开来的过程,也就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3](23-26)}。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已不局限于血缘、地缘为代表的同质性网络,而以工具性为标准由初级社会关系网络向次级社会网络推开形成差序格局。如果仅靠家人、老乡之间关系,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凭借这一网络实现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那些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关系,已经不足以使他们在城市中更好的立足和发展,因此,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培育和发展新的关系,在不断的社会互动中调整和重新建构自己和社会网络。封闭的社会网络需要不断扩展的原因:

1. 乡土社会网络的信任机制的破坏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曾说过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低信任文化的社会,信任只存在于血缘、亲缘关系上,中国就属于这样的社会^{[4](148-156)}。农民工就业以信任为基础,它为农民寻找工作提供信息降低了其就业成本,然而在人们以信任为基础的血缘、亲缘等初级群体中,信任机制逐渐被破坏,如杀熟现象的出现,在初级群体中,他们也会为已私利,利用这种信任,骗取这些网络中的人,因此,造成人们对这种关系的不信任,或这种网络的破裂。

2. 生存和发展两个阶段,所依赖的社会网络发生了差别

为了生存,紧紧抓住强关系,为了发展,就要紧紧抓弱关系。生存阶段,农民工交往联系的纽带仅限于已经形成的初级社会关系,亲戚、朋友、同学当成维系生存的基本条件。发展阶段,其社会网络已不局限于血缘为代表的同质性网络,而是不断向外扩张,触及许多异质的弱关系,异质群体构成他们带来比强关系制度化的非乡土性网络更多的社会资源,异质性网络纽带沟通不同职业,不同地位的群体,信息渠道多样而丰富。要在城市获得更长远的发展就必须突破传统、封闭式的社会网络,通过在城市就业建立新的业缘关系,因而使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弱关系是社群间沟通的桥梁,他们连接着分布范围很广的不同阶层的拥有不同资源的人们,人们透过弱关系所能接触的人更多,在社会上所能延伸的触角愈远,可以联络到更多更具异质性的人群,在资源的交换借用和摄取往往是通过它们来完成的,因此农民工要想在城市有更好的发展,就应该建立广泛的弱关系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3. 结构洞的开拓,可以获取更多新的社会资本

伯特是最早阐述“结构洞”这个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社会网络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与有些个体发

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个体不发生直接联系。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作“结构洞”。如网络中A和B、C发生联系,但B与C之间不发生联系,B与C之间就存在“结构洞”,A与B和C联系拥有B与C之间的信息资源。如果要实现网络的拓展,获取更多的资源,就需要不断地开拓网络中的结构洞,这种间接的人际交往使现代居民的社会网络有着极强的开放性和放射性,在日常的互动中,逐渐调查和重新编织着自己的社会网络,注入一此全新的社会元素,如老板、城里人、正式组织:当地居委会及政府与市场等异质群体和制度内关系,逐渐吸引到社会网络中来。随着农民进城就业,由农业生产向非农业生产转移,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扩展到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纽带,并使之成为其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他们在城市中获得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四、促进社会的融合——社会网络消融边界

布劳就曾指出,异质群体之间的交往,即使不是亲密的交往,也能够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理解,促进宽容精神的发扬。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个人和群体的社会整合更主要地是取于群际间的交往以及由于这种交往构成的广泛网络所给予的各方面的支持,整个人类社会交往以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同质群体和异质群体的交往不断扩大和相互作用的过程。随着中国都市化、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融入程度以及和谐程度,则是中国城市化成败的重要标志之一,处于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农民工,利用与网络内异质成员建立的交往,是率先实现与城市市民进行融合的一批人群,是融入与当地社会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先行者。

1. 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利于社会融合

(1) 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弥合城乡断裂

随着城市化,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不局限于血缘和地缘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网络,而开始转向开放的、次级的城市社会网络,这有利于他们从农民转变为市民身份,融入城市生活,形成城乡一体化。所以,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繁荣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与经济,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二元结构状况,促进城乡之间断裂的融合^{[5](96-99)}。

(2) 农民工进城就业为城乡带来经济效益,缩小城乡差距

农民工进城就业不仅为农村和城市创造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缩小了城乡差距,而且农民工进城就业,为农民工自己创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

距的扩大,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利于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

(3) 农民工进城就业利于城乡文化认同

农民工进城过程中,体验了城市生活,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张,也逐步接触与接受高层的社会文化,文化资本也具有多样性,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更新了自己的价值观念,逐步地融入到了城市的主流社会之中,不会被歧视与边缘化或形成小团体的亚文化,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也能找到归属感,也成为一名真正的城市市民定居下来。

2. 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的支持,促进社会整合

农民工群体本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形成的主要力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互动已经成为城乡融合的主要结合点,他们的关系网络和信任结构在短时期内是难改变的,所以城乡结合还需来自政府,舆论和各种社会支持系统的共同努力。以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以街道社区为纽带,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依托的社会网络支持系统。

非正式社会网络,主要是指农民工自身的血缘关系网络、亲缘关系网络、地缘关系网络、业缘关系网络等私人关系网。

在正式社会网络中,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应取消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保障农民工的基本生活;为农民工建立良好的就业机会,就业条件和环境,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其次,企业应以“以人为本”的思想为指导,改变对农民工歧视的观念,农民工是农村中的精英,应为他们提供广泛就业信息与指导,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与一系列的权利保障。再次,社区要为农民工提供一种良好的居住与生活氛围,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与安全感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参考文献:

- [1] 杨善华,谢立中.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 孙立平.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4] 费兰西·福山.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 [5] 李培林.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